

遺山樂府校註

〔金〕元好問撰 趙永源校註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遺山樂府校註

〔金〕元好問撰 趙永源校註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遺山樂府校註/(金)元好問撰;趙永源校註. —南
京:鳳凰出版社,2006. 5
ISBN 7-80729-044-7

I. 遺... II. ①元... ②趙... III. 詞(文學)—注
釋—中國—金代 IV. I222.84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6165 號

- 書 名** 遺山樂府校註
著作權人 (金)元好問 撰 趙永源 校註
責任編輯 卞 岐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 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鹽城印刷總廠有限責任公司
江蘇省鹽城市純化路 29 號 郵編 224001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28
插 頁 6
印 數 1—2500 套
字 數 54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729-044-7/I·26
定 價 78.00 圓
(鳳凰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題趙生永源《遺山樂府校註》

中州有樂府，遺山稱獨造。
剛健出婀娜，視辛尤同調。
太室卅六峰，劍鏖倚青昊。
長吁動星斗，雨冥風浩浩。
東海走黃河，三門扼其要。
搗鼓衝激湍，無煩燃犀照。
人間何物情，生死許相報？
今誦雁丘詞，猶絃千古弔。
土焦三月火，恨晚蒼梧叫。
作亭紀野史，窺斑存全豹。
蓋棺定論誰？我伏甌北趙。

賦詠到滄桑，著句便工妙。
裔孫起崑山，矻矻事箋校。
燭隱更發微，旁搜復遠紹。
漸積盈尺稿，芸窗十寒燠。
殺青近可期，索序遲我教。
忝充蟲魚師，難辟鉅釘誚。
惶引愧未能，拊掌一鼓噪。

西元兩千零五年歲次乙酉，寒露前二日，鍾振振撰於秦淮河西之西卯齋

前言

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元兩代著名的文學家。《金史》本傳云：「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

我們知道，金朝是由我國少數民族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於十二世紀初建立的政權。它佔據着淮水以北的中國廣大地區，與南宋構成對峙的局面。成長於北方的金代文學和哺育於南方的南宋文學是中華文化的共同組成部分。而金詞又是整個金代文學不可或缺的成分。誠如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在《全金元詞·凡例》中所云：「我國南宋時，北方先後為金元所據，作者習染詞風，詞亦多可觀。」又其「前言」云：「金元先後佔據北方，詞受兩宋影響，亦多可觀，如元好問、張翥，其最著者。」毫無疑問，元好問的詞在「可觀」的金元詞中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說代表了金元詞的最高成就。他的詞題材廣泛，表現的社會內容十分豐富，展現的生活面極為廣闊，舉凡詠物懷古、交遊酬唱、讚美山水、感時傷世、紀事言情等等，可謂包羅萬

象。如果說他的那些「紀亂詩」稱得上是「詩史」的話，那麼他的詞以其豐厚的容量，冠以「詞史」之名亦不為過。就遣山詞的繼承和融通來說，他的詞直承蘇、辛，有雄奇豪放的一面，又能兼容秦、周、姜、史等婉約詞人的風格，融會貫通，透顯出一種大家風範。就地域因素和民族特質給予遣山詞的影響而言，遣山既生長於北方，又是鮮卑族詩人，北方風土的雄渾厚淳和少數民族的質樸剛健，使得他的詞具有一種慷慨雄健的審美效應。縱觀元好問的詞，疏宕而不失粗豪，蘊藉而不失惻媚，在詞的發展史上可謂別開生面，獨樹一幟。特別是在元好問中年以後，官場的浮沈、社會的動盪、朝代的更替，使得他的詞更趨成熟老到，境界開闊，風格多樣，豪放之外濟以婉約，剛健之中不無婀娜，對於宋詞的拓展和推陳出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應當說元好問是最善於融合各種詞風的詞作家。然對於元好問在詞創作中的探索和創新，頗有人表示出不滿，最明顯的就是清代詞評家陳廷焯。他在《白雨齋詞話》卷三中說遣山詞是「別調」、「非正聲」。陳氏所謂「正聲」，實質上是一種不求變通、墨守成規的論調，不利詞的發展。而事實上遣山正是以他的這種「別調」，拆除「豪放」與「婉約」的藩籬，在他的詞創作中綜合融貫，大膽創造，「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矣」^{〔一〕}。說他的詞「集兩宋之大成」，未免有些過譽，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於元好問這樣的重要詞人的「爭奇求勝」，勇於創新，才使得金詞對於北宋詞的各種詞風都有所繼承，呈現出融會合流的趨勢，由此奠定了金詞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以往的文學史在闡述宋詞的發展時總是把北宋詞和南

宋詞相提並論，就朝代而論，本無可非議。然就地域來說，在政治上，金和南宋劃疆而治，在文學上，金代以其獨特的風貌雄踞北中國，可與南宋爭勝。已如前述，金詞是金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金詞在融會北宋詞風的過程當中，元好問以他在文壇上的領袖地位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中國，自女真人入主中原後，北宋詞和金詞就有一個交會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中原地區漢民族的農業文化和北方少數民族的草原文化交融與碰撞的過程。在這種交融與碰撞中，元好問不僅以其詩文成就，而且還以其極高的詞創作成就，成為兩種文化交叉點上的佼佼者。總之，元好問的詞在金代詞壇上、在宋金詞的發展史上都有着十分獨特的地位，用陳廷焯早年所編《雲韶集》中的話來說便是：「遺山樂府為金詞之冠，足以平晚賀、周、俯視百代。遺山詞以曠逸之才，馭奔騰之氣，使才而不矜才，行氣而不使氣，骨韻錚錚，精金百煉，別於清真、白石外，自成大家。」

在宋詞對金詞的熏染以及金詞對宋詞的吸納過程中，元好問起到了整合、出新甚或提升的作用。就宋詞對金詞的影響而言，主要表現在蘇、辛詞風對金代詞人的陶冶，並且成為金詞發展的主流。金代初年有蔡松年，中期有趙秉文，後期則有元好問，他們都是金詞學蘇的代表。有學者認為蔡松年學蘇得其形似，有首開風氣之功，「趙秉文在金朝文人中是氣質上最近蘇軾的一位，而元好問則是創作上最得蘇詞精髓的大家」^{〔二〕}。蘇、辛詞風能成為金詞的主流，除了地域、審美趣味等因素之外，確實跟趙秉文在當時文壇的盟主地位以及趙秉文

之後元好問掌文壇之柄有關。然真正從理論上確認蘇、辛詞風，則是從元好問開始的。他在《遺山自題樂府引》中說：「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後便到辛稼軒，此論亦然。」並且在創作上樹起蘇、辛大旗，以自己的創作實績，真正確立了蘇、辛詞風在宋代詞壇上的主體地位。然而，元好問的功績不止於此，還在於他於蘇、辛之外善於容納其他宋代詞人的格調，並能熔鑄成自己所特有的詞品、詞格。還是在那篇《引》中他這樣說道：「東坡、稼軒即不論，且問遺山得意時，自視秦、晁、賀、晏諸人為何如？」寥寥數語，卻可見出遺山的氣魄和胸襟。在如何繼承宋詞的問題面前，遺山表現出一種兼收並蓄、勇於超越的自負與自信。對此，南宋以及金代的一些作家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如南宋張炎論遺山詞時就說：「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三〕}金王中立《題裕之樂府後》說：「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能曉，送與凌煙閣上人。」勿庸置疑，在金詞詞風的形成及流變過程中，元好問既宗蘇、辛等豪放之風，又不廢周、秦等婉約之韻，可謂居功之偉，其貢獻是無法抹殺的，劉熙載說元好問詞集兩宋之大成或許推挹過甚，但說他的詞集金詞之大成，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正如唐圭璋、鍾振振先生在《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的「前言」中所說：「有金一代，能夠出入於兩宋諸大家之間的詞人，舍元氏而莫屬，則是可以定論的。得一遺山作為輝煌的結束，金亡而金詞為不亡矣！」

在宋、金詞的融通方面元好問的功績很大，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元好問對元代詞的

影響也不容忽視。清代詩評家趙翼在評元好問的詩歌創作時曾說：「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四〕}這是說朝代更替、國家興亡對遺山詩歌創作所帶來的深刻影響。金、元鼎革成就了元好問這樣的大詩人。同時，身處金、元兩朝的元好問，在當時詞壇上所處的位置也很特殊。毫無疑問，金詞是在宋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宋詞也就沒有金詞。而遺山詞融蘇、辛、兼秦、晁、賀、晏諸人，在宋金詞的溝通中，他扮演了關鍵角色。但不可小視的是在金、元詞的延續和傳承上遺山詞也產生了深巨的影響。我們知道，元好問是一個由金入元的詞人，他在金末元初文壇上的領袖地位和崇高聲望，使得他的詞對元代詞人仍有相當強的感召力。這首先可以從元人對遺山詞的高度評價上看出來。如元郝經《祭遺山先生文》說：「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元白樸《天籟集》王博文序云：「樂府始於漢，著於唐，盛於宋，大概以情致為主，秦、晁、賀、晏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詞英氣，天下之趨向始明。近時元遺山每遊戲於此，撮古詩之精英，備諸家之體制，而以林下風度消融其膏粉之氣。白樸判寓齋序云：「裕之法度最備，誠為確論，宜其獨步當代，光前人而冠來者也。」元劉敏中《江湖長短句引》說得更全面而透徹：「聲本於言，言本於性情，吟詠性情莫若詩，是以《詩三百》，皆被之弦歌。沿襲歷久，而樂府之制出焉，則又詩之遺音餘韻也。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東坡蘇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三家體裁各殊，然並傳而不相悖，殆猶四時之氣律不同，而其元化

之所以斡旋，未始不同也。」從元人對元好問詞的評價中不難看出，崇尚蘇、辛乃元好問詞創作的主體意識，也是其詞的主導風格，劉敏中說元好問詞和蘇、辛堪稱三家，「並傳而不相悖」，確實很有道理。他在詞中學蘇、辛的路子在元代繼續延伸。特別是元初的一批北方詞人，更是深受其影響，如白樸（有《天籟集》）、王惲（有《秋澗樂府》）、劉秉忠（有《藏春樂府》）、劉因（有《樵庵詞》）、劉敏中（有《中庵樂府》）等，他們沿着元好問所開創的蘇、辛道路繼續前行於北中國，與元代南方詞人的宗尚周、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由此也構建了整個元代詞壇具有南北之異的詞學風貌。遺山詞的這種承上啟下的情形，叫人想起宋代詩人石延年《題金鄉張氏園亭》中的兩句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其次，從詞作題材內容的演變來看，遺山詞對元人還是發生着影響的。這一點似乎也勿庸置辯。唐圭璋、鍾振振先生的《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前言》說：「與元代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相對應，元人筆下的好詞，大都集中在隱逸、山水、懷古這三大部類。元代的著名詞家，鮮有不同時或分別在這三大部類中舉旗拔壘、登壇拜將的。」而事實上，元詞的這三大部類題材在《遺山樂府》中無所不備，我們可隨手拈來這方面的詞例。諸如：《水調歌頭》（空濛玉華曉）、《水龍吟》（接雲千丈層崖）、《沁園春》（腐朽神奇）、《最高樓》（商於路）、《聲聲慢》（林間雞犬）、《洞仙歌》（黃塵鬢髮）、《江城子》（草堂瀟灑浙江頭）、《行香子》（漫漫晴波）、《臨江仙》（夏館秋林山水窟）、《鷓鴣天》（拋卻浮名恰到閒），等等，以上隱逸類。《水調歌頭》（灘聲

蕩高壁)、前調(黃河九天上)、前調(雲山有宮闕)、《摸魚兒》(笑青山)、《臨江仙》(荷葉荷花何處好)、《清平樂》(江山殘照)、《浣溪沙》(湖上春風散客愁)、等等，以上山水類。《水調歌頭》(牛羊散平楚)、《木蘭花慢》(擁岩岩雙闕)、前調(渺漳流東下)、《滿江紅》(江上窪尊)、《八聲甘州》(許君祠)、前調(玉京巖)、《摸魚兒》(問樓桑)、《婆羅門引》(短衣匹馬)、前調(嶧山霽雪)、等等，以上懷古類。而深受遺山影響的北方詞人如劉敏中、劉因、許有壬、白樸等，包括南方的張翥、薩都剌等在這些門類題材的創作上都有突出的成績，確能代表元代詞的高度成就。

因此，把元好問置於金、元詞的演變發展史上來考察，其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不言而喻。元代一向被認為是詞學的衰落時期，於是乎就有所謂「詞衰於元」的說法。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觀點的片面性，提出「元詞是宋詞的延續與餘波，延續了它積極的一面，也延續了它不可避免的衰頹趨勢，然而不能就此認為詞的衰落是從元代開始的以及元代詞壇只是一片衰闌景象。……以一「衰」字來概括元詞的歷史地位無疑是不合理的和不全面的」^{〔五〕}。如果說鍾武蘇、辛詞是元詞延續宋詞的積極一面的話，那麼跨金、元兩朝的元素好問憑藉他大倡蘇、辛的詞論和融化蘇、辛的詞篇就成為影響有元一代詞的發展走向的重要詞人。

總而言之，從一部《遺山樂府》中可以探得其總金詞之大成的風貌情韻，也可以窺探其在元代詞壇上的流風餘韻。換言之，《遺山樂府》可說是金、元詞史上的一座豐碑。不讀遺山詞

則無以探究金、元詞之特質和面貌。

綜上所論，遺山在金、元詞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已不容爭辯。當然，假如我們捨棄一般的思想、藝術分析模式和思維角度，而改用不同的視角來審度遺山詞，那麼遺山詞確實還有不少獨特之處值得探討。

其一，元好問是在具體詞學理論指導下進行詞創作的金代最重要的詞人。和他所推崇的宋代詞人蘇軾、辛棄疾相比較，遺山似乎有着更為完善和具體的詞學理論主張。就蘇軾而言，他以詩為詞，新天下耳目，但是有關對詞的看法並不是很多，最著名的要數他在《祭張子野文》中的一段話：「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又《與蔡景繁簡》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他的這些話可以說是他「以詩為詞」、進行詞體革新的理論綱領。他的詞「蓋詩之裔」的觀點對遺山影響頗大，遺山對詞的理論闡述就是在這一觀念上展開的。詞既然也是詩，那麼就要像詩那樣崇自然、主性情。這又與他的論詩主張是一致的。可以這麼說，遺山的詞學理論是其詩學理論的自然延伸。主張率真自然，以吟詠性情為主，注重詞的固有特質，這是遺山詞論的基本內涵。其詞論主張主要見於《遺山自題樂府引》、《東坡樂府集選引》、《新軒樂府引》等序文中。應該說，遺山是一個詞學理論與詞體創作結合得很好的金詞大家。正因為要自然率真，所以他的詞以疏快見長，即便寫情也是流利清朗，以真取勝，決不忸怩作態，他的那句「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

許」，何以能傳唱至今？就是因為它真摯、率直而能打動人心。但遺山也不是一味地追求疏朗而忽視詞體所固有的藝術特質。他的有些詞確有淒迷幽約之致，如他的《鷓鴣天·宮體八首》、《薄命妾辭三首》借助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抒寫其故國之思、身世之感，頗得詞體「深美閎約」之妙。詞學大師吳世昌先生對清代詞評家陳廷焯視遺山詞為「別調」、「非正聲」而不見其《鷓鴣天》詞，斥之為「有眼無珠」^{〔五〕}。總體來說，由於有具體的詞學主張引導，所以遺山詞還是表現出非常鮮明的特色。繆鉞先生說遺山「在填詞的實踐中，未能完全體現他在理論上的認識，於是疏快豪健有餘，而渾化醞藉不足」^{〔七〕}。對繆先生的看法筆者實不敢苟同。「疏快豪健」、「渾化醞藉」，遺山詞都具備，只是在表現上有輕重主次之別而已。元好問既有他的詞學理論主張，又有相當數量和品質的詞創作，這在金、元詞壇上甚而至於在中國詞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其二，與元好問的詞學主張相聯繫，他的詞體制兼備。在元好問的詞學理論體系中有着鮮明的體派觀念，主要表現在他對「東坡體」及「宮體」的體式特徵和價值的認識上，對此趙雋江先生的《金元詞論稿第六章《遺山詞論，北宗詞的理論總結》第四節《體派論》有十分精闢的論述。其實元好問詞學理論中的「體」的觀念與他在詩歌理論批評體系中的「體」的觀念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的《論詩三十首》第一首便開宗明義地說：「漢語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他以「詩中疏鑿手」自任，把杜甫《戲為六絕

句》中提出的「別裁偽體親風雅」加以具體化，進而提出了「正體」的觀念，就漢魏以來的歷代作家辨其正偽。詩中所謂「正體」，當包括以杜甫為代表的「古雅」、以陶潛為代表的「古淡」和以曹、劉為代表的「豪壯」。那麼，遺山詞學理論體系中的「正體」是什麼呢？當然是「東坡體」。在《遺山樂府》中有兩處提到「東坡體」，即《鷓鴣天》（煮酒青梅人坐新）之詞題曰「效東坡體」以及《定風波》（離合悲歡酒一壺）之尾註曰「永寧范使君園亭，……用東坡體，擬《六客詞》」。另外，在《促拍醜奴兒》（朝鏡惜蹉跎）、《思仙會》（人無百年人）中分別提及「閑閑公體」和「楊吏部體」。「閑閑公」即趙秉文，「楊吏部」即楊雲翼。趙、楊為一時人物領袖，都是東坡的追隨者，並稱「楊趙」。元好問在他的詞作中明確標示「東坡體」，繼而又標明「閑閑公體」和「楊吏部體」，由此可見，「東坡體」作為他詞學理論中的「正體」而始終橫亙於心中。除此之外，在《遺山樂府》中尚提及「花間體」、「朱希真體」、「俳體」、「離合體」、「宮體」、「獨木橋體」等不同體式。不難發現，遺山雖以「東坡體」為正體，但仍不棄其他體式，體現了他崇尚蘇、辛又能融合諸種體式的詞創作特色和圓通的創作態度。元好問在詞創作中不止一次地標明「某某體」，這在金、元詞人中實屬少見。元徐世隆《元遺山詩集·序》云：「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可謂切中肯綮。

其三，遺山詞之融化唐詩與學杜。毫無疑問，遺山詞融化唐詩是整個金代詩壇宗唐風氣

之使然。關於金代詩壇的宗唐風氣，元劉祁的《歸潛志》有較詳細的記載，其卷八云：「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元好問在《楊叔能〈小亨集〉引》中也說：「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漢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以唐人為法，「以唐人為指歸」，無疑是金代詩壇的一大特色。這一特點至金宣宗南渡後越發明顯。就元好問詞的創作來說大致也在這個時候逐步進入高潮和豐收期。所以遺山詞融化唐詩可以說習染了當時整個詩壇的風氣。當然最關鍵的是元好問對唐詩能有客觀公正的評價。有學者認為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旨在辨明師古正途：對魏晉南北朝以頌揚為主，意在指出師古典範。對唐人詩歌的評判側重於創作的途徑、方法和創作甘苦，一般不作頌揚式的讚語，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其成敗優劣^{〔九〕}。正因為遺山對唐詩有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所以其詞體創作在唐詩面前首先是全方位的吸收以汲取藝術營養。遺山詞能融化唐詩各期詩人的語句、語意，尤其是唐人詩歌的意境神韻，這可以說是遺山詞融化唐詩的最高境界。這裏試舉他的一首小詞以說明問題，其詞曰：「離腸宛轉。瘦覺妝痕淺。飛去飛來雙語燕。消息知郎近遠。樓前小雨珊珊。海棠簾幕輕寒。杜宇一聲春去，樹頭無數青山。」^{〔一〇〕}這首小詞雖然沒有直接化用唐人詩句，但整首詞的意境和風貌卻頗似唐人絕句。當然，唐人對元好問詞創作影響最大的非杜甫

莫屬。若論個中原委，無疑是其尊杜意識的反映。遣山嘗作《杜詩學引》，集中反映了他對杜甫詩歌的看法，他說：「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彷彿其餘韻也。」這段話體現了元好問對杜詩的總體認識。他推崇杜詩的「元氣淋漓」、「浩瀚無涯」、「千變萬化」，表現在他的詞創作上即追求亢爽清疏的詞風，崇尚雄渾深厚的意境，所謂「有骨幹，有氣象」、「亦渾雅，亦博大」，不只套用、化用杜甫詩句，更能規模和融合杜詩的氣韻和精神。可以這麼說，在金、元詞壇上，元好問是學杜最為成功的詞人。

其四，元好問「史」的意識對其詞創作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知道，元好問的一生以詩名，晚年又以史名顯於後世，是金、元之際著名的史學家。他在《學東坡移居八首》的第六首中說：「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裨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元氏搶救史實的良苦用心和據實直錄的史學精神昭然若揭。正因為有這種苦心和精神，所以他編《中州集》時給每位詩人列有小傳，還附加史事小注。它保存了金代文人的出身、行年和著述，是研究金代文人、官制、史事和著作的重要資料，《中州集》由此被稱為「以詩存史」的佳著。這種特點同樣也體現在作為有金一代詞集的《中州樂府》中。他在《自題〈中州集〉後》中